

檔案敘事

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江樹生 著



檔案敘事
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江樹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 江樹生著.
-- 臺南市：臺灣史博館，2016.12

面；公分. -- (研究專刊；5)

ISBN 978-986-05-0969-4(平裝)

1.荷據時期 2.臺灣史 3.文集

733.2507

105022439

研究專刊5

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發行人 王長華

作者 江樹生

校稿 王靜慧 陳瑤真

行政執行 謝仕淵 陳靜寬 王美雯

執行編輯 林孟欣

出版發行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電話：06-3568889

傳真：06-3558393

網址：<http://www.nmth.gov.tw/>

美術設計 游明龍設計有限公司

GPN 1010502624

ISBN 9789860509694

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

定價 新臺幣360元

推薦序

奠定荷蘭時期臺灣史研究的堅實基礎

江樹生先生關於荷蘭時期臺灣史的研究論文，將要結集出版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同仁要我為這本論文集寫一篇序。我就趁此機會介紹個人所知道的江樹生先生是如何地幾十年一路走來，專心致力於為國人之荷蘭時代臺灣史理解建立堅實基礎，讓國人一方面得以理解幾十年來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大致脈絡及江先生的成就與貢獻，並向他致敬。

江樹生先生是我臺大歷史系啟蒙老師鄭欽仁教授在東海大學歷史系時代的同窗好友。因此，1970年代中期鄭老師引導我進入臺灣史領域之初，就經常聽鄭老師提到他這個大學時代住同一寢室、一起打球的好友。當時我知道江先生曾在陳紹馨教授指導下研究明清時期漢人移民臺灣的歷史，後來任教於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1971年以文化學院交換教授的身分，赴日本天理大學任教，結識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的專家中村孝志教授，並在中村教授指導與鼓舞之下決定以荷蘭時期臺灣史作為自己的學術研究主題，並於1975年進一步赴荷蘭萊頓大學留學。

1977年，我認識當時參與日本學術界大型研究計畫「文化摩擦」而來臺蒐集資料的中村孝志教授，從此便不斷獲得這位廣泛理解臺灣史之碩學大家的指導，並在各種談話的場合得知江樹生先生在荷蘭的研究狀況。當時，以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樹生、Leonard Blussé（包樂史）、Margot E. van Opstall等人組成的跨國研究團隊正在編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熱蘭遮城日誌¹。這個計畫的成果後來於1986-2000年出版De

1 關於這個整理出版熱蘭遮城日誌計畫的簡單介紹，可以參考李美媚、吳密察譯〈大員熱蘭遮城日誌刊行計畫〉，《臺灣風物》第30卷第1期（1980）。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4 vols.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86-2000) (《熱蘭遮城日誌(1629-1662)》) 四巨冊，列入荷蘭《國家史料叢刊》。這部荷蘭文《熱蘭遮城日誌》出版時，對於其中的東亞之人、地名、地名的比定與註解，顯然有賴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樹生等這幾位嫻熟日文史料的專家，尤其江樹生先生的貢獻應該不少。

1980年代晚期，國人熱切地想要理解臺灣歷史之際，國內素有聲譽的漢聲雜誌社委託江樹生先生在荷蘭就近從荷蘭國家檔案館裡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編譯臺灣相關的史料，並於1992年出版了江樹生先生編譯的《鄭成功和荷蘭人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臺北：漢聲雜誌社，1992）。在此之前，國內之研究者對於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這場戰爭之細節，雖然有各種爭論，但卻無法大量而精緻地使用可信性較高的荷蘭原文史料，如今江樹生先生透過精密嚴謹地翻譯、考訂荷蘭文的相關檔案，而且配合上漢聲雜誌社優秀編輯的圖像資料解讀，終於使得這場臺灣歷史上的重要戰爭活潑生動地被重建在數百年後的紙面上。這本既有堅實的內容，又精美生動好看的歷史書出版之後，我主動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推薦文章，題目就取為〈應該得獎的一本書〉²。江先生與漢聲雜誌社在此次合作之後，又陸續出版了Kees Zandvliet（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下冊（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和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社，2003）。前者是江先生與一位熟悉荷蘭東印度公司老地圖的專家，共同介紹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絕大部分的17世紀臺灣老地圖；後者則是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個小職員的日記，來看當

2 中央日報，1993年2月17日「讀書出版」專欄。

時的臺灣。這兩部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所寫成的著作，為國人的荷蘭時期臺灣史知識，開拓出了一個廣闊的前所未知的世界。

如果說與漢聲雜誌社的合作，讓江樹生先生得以很順利地推廣、深化國人的17世紀臺灣史理解，並讓他在臺灣的一般讀書界獲得聲名。那麼，下面介紹的這項長期而且樸素的工作，則是為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1990年，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下，我結合一群學術界的先進、朋友展開了蒐集、整理、編製「中美荷日公藏臺灣史檔案手稿資料聯合目錄」的工作。當時，我想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臺灣相關史料做一次比較全面性、系統性的調查。這時中村孝志教授向我積極推薦江樹生先生來做這項工作，他說江先生是最適合來做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江樹生先生在接受這項工作委託之後，便全力投入工作，並在計畫結束後將其調查成果出版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檔案目錄》（臺北市：臺灣大學，1997）。這是目前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臺灣相關史料最詳盡的目錄，透過它吾人可以對17世紀荷蘭檔案中的臺灣史料之全貌有了總體的掌握³。

3 在此之前，我們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臺灣相關部份的理解，基本上是憑藉戰前臺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岩生成一等學者的調查和戰後日本學者在調查日本相關檔案時所延伸摘錄的成果。經常被利用的目錄有：岩生成一〈和蘭國立文書館所藏臺灣關係史料に就いて〉，《南方土俗》第2卷第1號（1932）；移川子之藏〈和蘭ハ--グ國立文書館所藏臺灣關係文書目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5輯（1938）；移川子之藏〈和蘭の臺灣關係古文書〉，《愛書》第10號（1938）；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Shiryō Hensan-j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目錄，part.1-5 オランダ國所在文書.1-5（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in Foreign Countries, v.1-5, The Netherlands）》。

1990年代，江樹生先生在上述《熱蘭遮城日誌》之荷文版工作大致完成之後，更毅然決定進一步將這部17世紀前半葉臺灣最重要的荷蘭文史料集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又是一項需要耗時長久的偉大工作。結果，江先生用了10餘年的功夫，完成了這項吃力的工作，並由臺南市政府出版《熱蘭遮城日誌》全4冊（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00-2011）。《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版出版的意義，宣告國內之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從此將要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在此之前，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基本上只能借助日本學者的所奠下的基礎。不但研究材料，即使研究主題，都不出戰前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師生（移川子之藏、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的範圍。甚至，戰後不少對於荷蘭時期臺灣史的研究，還靠的是當年村上直次郎教授從荷蘭文《巴達維亞城日誌》所摘譯成日文，再翻譯成中文的「間接史料」呢！當年國內研究者所使用的《巴達維亞城日誌》，並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商館的日誌，而是東亞總部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的日誌；而且，它是從荷蘭文翻譯成日文，再從日文二度翻譯成中文的史料。對於理解荷蘭時代臺灣史來說，它的史料價值當然遠不如直接從荷蘭文翻譯成中文的《熱蘭遮城日誌》（當然，如果可以直接閱讀荷蘭文的《熱蘭遮城日誌》那就更好了）。以前，限於各種條件，臺灣學者對於荷蘭時期臺灣史研究，可以說是「因陋就簡」的，有時候也可以說是繼承「殖民地時代之遺產」的。如今，因為江樹生先生30餘年間（1977-2011）的投入，國人對於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理解，終於得以透過自己可以理解的語文來閱讀直接史料（《熱蘭遮城日誌》。其實，也不妨說成是《臺灣城日誌》）了。

《熱蘭遮城日誌》之中文版陸續出版之後，江樹生先生進一步與翁佳音先生合作翻譯出版荷蘭東印度公司歷代臺灣長官向巴達維亞總督提出的書信集。這又是一項需要長久持續的史料編譯工作。目前這個史料翻譯計畫，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支持下，已經出版《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五冊。但願這個計畫在不久的將來，也可以豐收完成。

這樣回顧下來，我們看到近百年來關於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大致軌跡。這個領域的研究，可以說肇端於日本的學院歷史學出現之際。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的開山教師Ludwig Riess於1890年代晚期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研究了臺灣早期歷史，以幾次演講之內容結集出版《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臺灣島史）》。Riess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時代之初期學生村上直次郎，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期間，利用參與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的機會，從當時已經出版的《Dagh-Register G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巴達維亞城日誌）》中摘譯臺灣、日本相關史料（從荷蘭文翻譯成日文）。接下來的世代是同時期於臺北帝大擔任助教授的岩生成一；他在利用荷蘭檔案研究16-17世紀日本史之餘，也兼及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相對於村上、岩生兩位先生在研究日本史之餘，兼及臺灣歷史；他們1930年代在臺北帝大史學科訓練出來的學生中村孝志，終於成為首位專研荷蘭時代臺灣史的專家。這個在殖民地學術情境下發展出來的荷蘭時代臺灣歷史之研究脈絡，一直就是臺灣歷史學界理解臺灣早期史的資源與養分，即使在戰後幾十年之後情況仍然沒有太大改變。

1990年代起，中村孝志教授鑒於後繼乏人，以其使命感在晚年重拾荷蘭時期臺灣史研究，並積極鼓勵年輕研究者投入此領域的研究⁴。同時，長期浸淫荷蘭檔案史料累積有相關學養蓄積的江樹生先生，也逐漸在臺灣嶄露頭角，並如上述般地陸續出版相關研究並系統性地翻譯第一手之荷蘭檔案史料。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終於因此得以進入國人「自力更生」的階段。

江樹生先生，就是在這個「自力更生」階段建立堅實之基礎，而且付出重大貢獻的人。

國史館 館長

吳密察

4 我在1980年代晚期曾經多次公開表示（包括直接向中村孝志教授提起），以當時臺灣的情況，荷蘭時代的臺灣歷史理解仍然未脫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研究成果之域，而且如果沒有特別鼓勵，在二十年內還是難以培養新一代的該領域研究者。關於此事，可參考吳密察、若林正丈合著《臺灣對話錄》（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9年）。中村孝志教授，認為既然臺灣學術界的情況如此，他應該回過頭來繼續做一些已經停頓下來幾達20年的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也積極鼓勵年輕研究者從事該領域的研究，而且他認為既然他數十年前的研究論文還是大家經常參考的，他便應該對這些以前的研究作一番修改。於是，他在1989年出席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會議時，便刻意介紹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中村孝志〈オランダ時代臺灣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收入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1992年，翁佳音利用荷蘭文史料的研究，指出17世紀臺灣中部地區存在著一個勢力龐大的「大肚王」（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第42卷第4期）。他老人家也特別立刻於翌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來呼應（中村孝志〈オランダ治下，中西部臺灣におけるクワタONG Quataong村落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第172號）。同時，他著手陸續修改以前的相關舊作，交給我們編譯成中文出版論文集（《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下卷（台北：稻鄉出版社，1997、2002））。

推薦序

土地・人民視野的歷史

一、歷史的歷史

這本論文集，收錄江樹生教授四篇荷蘭時代的〈梅花鹿〉、〈藍鯨的開始〉，以及〈熱蘭遮城市〉、〈漢族人口〉研究文章。他是首位能夠深層、而且正確運用荷蘭原檔研究的國人，內容多屬創見，為研究者必須參考與徵引的重要文獻。可惜，文章除〈藍鯨〉一文刊載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臺灣文獻》外，其他三篇為委託研究計畫或研討會論文，一般研究者不易取得。因此，數年前即有某著名出版社透過我接洽江教授出版，也請我與林孟欣博士幫忙，有一段時間我們三人分身乏術，一直延宕，出版遂無下文。

所幸孟欣後來進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服務，他已將江教授文章整理完畢，並建請館方出版，經雙方同意，書名冠題《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也對，這本老派學者的心血結晶，由國家的歷史博物館印行，反而更具深刻意義。底下，容我，也算是這一行業的老兵，對此稍作一些背景說明。文史學界大概無人不知江老師是研究荷蘭時代的資深學者、四大鉅冊《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的譯註家。國史館館長吳密察教授文章已有深入論介，我就按下不表，改從有關荷蘭時代歷史敘述／研究的沿革，換句話說，我從臺灣史的歷史角度來談，內容難免會艱深一點，但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讓讀者再感受江教授迄今業績的重要性，以及難以凌越之處。

國內出現荷蘭時代臺灣史的文獻記錄，當然可推很早。至少，清代地方志已頻繁提及紅毛城、揆一王，以及王田、贖社等歷史事項。但有點奇怪的是，西班牙人統治臺灣的紀錄，反而相當寡少，甚至難見。這不外表示，臺灣史一直是有荷蘭時代這一段。在國外，則有十八世紀初F. Valentijn牧師的大部頭書《新舊東印度公司志》。書中，有小

部分提到臺灣歷史，卻因是荷語，外界知者很少。比較系統被介紹與翻譯的，當然是在十九世紀六七零年代之後，臺灣政經地位再度引起外國注意的時段，歐美人士試圖在以前的歐語文獻中再瞭解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的李仙得（Le Gendre）《臺灣紀行》，就是其中為人所熟知者。

也在此時，歐美基督新教正逢海外大宣教時代浪潮，荷蘭東印度公司轄領時期的亞洲改革宗宣教文獻，因應時勢而被編輯成冊。臺灣還是其中最為人稱讚、從無到有的東亞首宗新教範例，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甘為霖（W. Campbell）牧師不久使用英文譯註成《荷蘭治下的臺灣》，並成為將近百年來，研究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經典文本之一。

二、兩個研究潮流

十九世紀末，同時也是歐洲官產學界對殖民地研究的昂揚時代。荷蘭國內，以及殖民地官僚和學者，開始系統編輯與註解東印度公司有關亞洲地區的檔案與史料。其中，最為大家熟悉的，當然是荷蘭史家從1896年開始到1931年之間，陸續註解與出版1624年至1682年亞洲東印度公司總部的日誌檔案，合計三十一冊。這《巴達維亞城日誌》，稍後便由日本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聘請村上直次郎教授摘譯其中有關臺日文獻，後來單獨形成中村孝志教授校注的三冊流行版。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省文獻會再輾轉翻譯成中本，與上述甘牧師英譯之書，大概可說是國內研究者眼中的史料雙璧了。

以上背景，多少已顯示荷蘭時代文獻，在本質上是屬於「貿易公司」與「海外殖民地」、「海外宣教」，以及歷代統治者所欲參考的內部資訊。VOC（荷蘭聯合東印度公

司），是荷蘭「黃金時代」的著名跨國商業機構，並領有臺灣以及大部分東南亞島嶼。VOC當時的非凡商業才能與有效統治技術，當然會受到後世，尤其是荷蘭官方學界的積極關注與研究。十九世紀末，荷蘭殖民史家甚至自豪而主張：由於公司的亞洲區間貿易策略奏效、海船運輸與動員靈活，因此他們能以極為有限之人員與武力，在海外控制廣大的印尼地區，形成所謂的泛蘭和平（Pax Neerlandica）時代。

如此歐洲優越的說法，並未被某些歐美研究者有系統地嚴肅批判，而於不經意之間接受。他們認為十七世紀初，猶處於原始社會、無秩序的臺灣島，在VOC武力與基督教新教牧師聯合下，經一連串的南征北討之後，大約從1636年開始，臺灣走向泛蘭和平，或泛蘭治世（Pax Hollandica）的時代。改革宗基督教於臺灣的短暫宣教，如上所提，是難得的範例，因此在全球宣教史研究上，臺灣這段歷史，敘述通常是正面大於負面。不僅如此，臺南原住民還在此階段中，被描繪成因受教會教化而成長為文明族群，並且擁有了原住民歷史上首次的書寫文字，亦即西拉雅語的「新港文書」。

相對於上述歐美世界傾向之國際觀研究，屬於相同路線的亞洲研究者當然有時候會採取另一種觀點。所謂亞洲立場，最明顯就是重點放在鄭成功，或他家族之海上勢力，以及海洋貿易。這一點，恰好符合戰後轉進來臺的國民政府之意識型態，即反西洋列強侵略「中國」、「民族英雄」光復臺灣，以及「中國」海洋精神代表人物等等。所以，國府統治初期直到1980年代中期，「荷據」時期的研究，通常與「明鄭時代」難分難捨，國內的研究，主要還是透過上述英日語的轉譯文獻，或譯介荷語文獻與檔案中的鄭成功相關文獻。

國內這種僅能運用再轉譯文獻研究之趨勢，於1980年代後期，隨著《臺灣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荷語本的陸續出版，情況開始有扭轉的跡象。江樹生教授一直是這波史料出版與譯註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且有自己的主張，因而自此之後，荷蘭時代研究路線的另一伏流逐漸竄出地表，構成另一支值得持續關心與挹注的研究潮流。

三、落實土地視野、住民主體

上一節所言東西貿易、海外殖民與宣教，以及被殖民的民族英雄研究取向，用歷史學術語來說，是屬於十九世紀以來西洋世界史、新興民族國家的「大歷史」傳統，你要說它是具有國際觀與巨大視野的最理想研究，也可以。然而，這種論述，被研究／敘述對象之土地與人民，往往淪為歷史配角。於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幾百年的歷史，內容老是有被平定、被馴化、被光復的文法，以及「貿易轉運站」、「復國基地」與「美麗寶島」之修辭。臺灣史，難免在某些人感覺裡，結局變成「為人作嫁」，失去場域與個人的主體性。

觀察者各站立場，是正常。因此，東亞史研究者面臨歐洲優越、泛蘭和平主張時，會相應提出十六、七世紀，東亞海域早有難以撼動的政治經濟網絡／結構，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蘭因而不易在東亞取得穩固據點。甚至VOC領有臺灣後，雖已盡最大努力，但不管是境外貿易還是境內治安，依然會受到明清政局與鄭氏之外各路「海賊」的影響。日本學者就曾主張說東印度公司在臺三十餘年，一直為鄭成功家族所操弄，難能如意。因此，宣稱當時臺灣進入泛蘭治世，恐有失誇張。從原住民立場反思亦然。原住民西拉雅族社會的變遷，1620年代初的荷語文獻都指出變化早在進行，更早的〈東番

記》也記載這個現象。進一步，短短一世代，即大約三十年的基督教教化，真的有辦法讓西拉雅族徹底移風易俗？清初的《諸羅縣志》都還有該族淫風異俗之記錄，讓人不得不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宗教影響力，稍作保留。

當學界尚未冷靜反思上述命題時，八、九〇年代，國內文化知識界又颳起「海洋史」的風浪。也許江先生長年旅居海外，所以能保持一定的客觀、冷靜。他曾說，他承認海洋史研究非常重要，卻覺得作為臺灣人，反而更急切想知道這塊土地在荷蘭時代到底發生了啥事？所以，江樹生教授多年來，在缺乏學術主流資源的援助下，獨立進行檔案譯註，荷蘭時代中譯文獻的基礎工程，幾乎全在他手上完成，我看短期內可能後無來者。進而，本書收錄的四篇研究論文，所建構出來的梅花鹿數量、漢人移民人口數，以及經濟作物田園之開墾、城市的建立，都是一筆一筆在刻畫島上發生之事，本土部分歷史圖像因而清晰起來。

海洋／宏觀／理論，相對另一條線，本土／微觀／實證，當然不是從江樹生才開始。日本時代村上直次郎在譯註文獻時，已同步發表澎湖、臺南與基隆築城相關文章；後來，中村孝志直接運用檔案發表一連串番社、教育與稅收等紮實論文，稱他為荷蘭時代臺灣史實證研究的祖師爺，絕非過譽。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人為了研究原住民相關歷史，委託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人員拍攝與抄寫相關檔案，並開始解譯檔案中的番社地點，上述的中村，以及馬淵東一，是代表人物。可惜，戰後政權轉換，國內此類路研究線一時中斷。1980年代到幾年之前，由荷蘭人主導刊印文獻過程中，國內學界當然以國際研究路線為時尚。幸虧江教授堅持急切探究本土究竟發生何事的主張，我們的荷蘭時代臺灣史，才能在濃郁的「歐洲」或「中國世界史」味道之外，兀自飄揚著本土的芬香。

四、這本書的啟發

吳密察館長於文章中，推崇江先生是為荷蘭時代研究「自力更生」階段建立堅實之基礎，而且付出重大貢獻的人。這話當然不是客套應酬，我的學界經驗與觀察，完全同意他的說法。臺灣史研究在國際化的同時，本土自主自覺，仍然不可或缺。江教授的自力貢獻，以及此書的問世，正好提供我們繼續思索這方面的問題。我最後舉兩個例子，就當作是本書的響應。

一是我長年研究與經驗中，總是遇到不少國人對荷蘭，或荷蘭文獻檔案有一種浪漫情懷的認定、期待和想像。他們認為荷蘭人會主動與善意記錄臺灣土地與人民的歷史，所以對荷語資料充滿著期待。他們也想像著：荷蘭人在大航海時代很重視、並且經營著所謂的「亞太航運中心」臺灣。

後者的想像，恐怕不少人會失望。十七世紀東印度公司經營臺灣前後，還是多次遣使大明與大清中國，希望直接在帝國版圖之內與中國人交易，離開臺灣，只是早晚之事。大航海時代，亞洲區域船來船往、千帆萬篷，臺灣（臺南）為清楚可見之新興城市。然而如今，在外國學者論文中，臺灣多被摒棄視域之外，他們寧可多關注中國。

至於荷蘭人留下的文獻檔案，我前面已提過，她的本質是商業公司資訊與情報，因此不宜過份樂觀期待。我認為，要把荷語材料轉化為本土住民可利用文獻，還得多一點認同江教授主張的人來參與。這便是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藉此鼓勵有心的讀者仔細閱讀，並靈活利用他的研究成果發展出自己的論述。

例如，本書〈藍靛的開始〉一文，是我相當推薦的研究之一。文中有間接引用到公司位於潭（meer）邊的藍田（indigo velden）每年照例出贖之資料。其中，有一段說：

公司的藍靛之湖，大約有130摩亨（morgen）土地，以33張犁（33 stucx ploech），或牛隻（runderbeesten），出贖一年，條件中規定若牛隻死亡得賠20里爾。

看到這段敘述，我會建議讀者把江教授的研究放在清代文脈來結構想像。「藍田」，就是一般閩南語系族群所說的「菁園」、「菁埔」；至於當時種植的「菁」，是小菁（木藍），有無大菁（山藍）？專家可繼續再討論。這段敘述，還可讓我們想到1650年代初期的牛價，有心的研究者可再從文獻中整理出牛隻引進臺灣，從每隻三十四兩、到二十兩，到十九世紀的十兩銀前後，有趣吧。

此外，資料中，130甲用33張犁，或33頭牛來計算的紀錄，也可讓研究者想到，當時是用一隻牛／一張犁來耕種130甲的菁園，那麼，一張犁大概可耕四甲之園。如此，臺灣史研究者馬上可聯想到清代《淡水廳志》賦役志提到臺灣田賦計算，與中國有所不同：

……自荷蘭令中土遺民受種，以十畝為一甲……年修陂圳之費以及耕具皆荷蘭賞給，名曰王田……臺灣以一丈二尺五寸為戈，周圍一百戈為一甲（又五甲為一張犁，故地名有若干張犁，亦因甲稱之）。

中國田園課徵，以畝計算，臺灣卻用「甲」。「甲」是不是源自荷語「akker」，恐

怕還有得討論，至少是單位不合。暫不管此爭議，重點在清代人認為一張犁約五甲的計算方式，是從荷蘭時代開始。這應該無誤，至少就我所知，中國閩粵一帶無此用法。荷蘭時代創造發明的，以一張牛犁計算四至五甲旱園或水田，變成臺灣的傳統了。臺灣處處有三張犁、四張犁、六張犁，甚至十二、三十張犁的地名，正好標誌了這個歷史痕跡。

但最有意思的是，江樹生教授告訴我們：荷蘭時代十幾年的藍靛慘淡經營，結局是在臺灣生根蔓延，到了清初還成為輸出中國的貨物之一：「臺灣出產甚饒，米、糖、油、靛販鬻半天下」。外來移入本土之物，由土地發揚光大，而且成獨特之歷史，這是我在閱讀本書時的深沈感受，分享給有志者共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翁佳音

